

江文通集校注

—



〔南朝梁〕江淹 著
丁福林 楊勝朋 校注

江文通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江文通集校注 / [南朝梁] 江淹著；丁福林，楊勝朋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2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8645-5

I. ①江… II. ①江… ②丁… ③楊…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南朝時代 IV. ①I213.9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64255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江文通集校注

(全四冊)

[南朝梁] 江 淹 著

丁福林 楊勝朋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60 插頁 22 字數 1,558,000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50

ISBN 978-7-5325-8645-5

I·3224 平裝定價：23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江淹評傳（代前言）

一、貧賤坎坷的青少年時代

江淹字文通，生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四四四），卒於梁武帝天監四年（五〇五），歷仕宋、齊、梁三朝，爲南朝最爲著名的文學家之一。《梁書》卷十四《江淹傳》、《南史》卷五十九《江淹傳》以及江淹的《自序》皆說他是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人，但是根據《元和姓纂》的記載，濟陽江氏早先族居於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其後始「因居考城爲著姓」。《晉書》卷五十六《江統傳》及卷八十三《江道傳》即記江統及其侄江道爲陳留圉人。濟陽江氏自江統而後始貴顯，自此以後，濟陽考城即成了江氏的郡望。故江統之前史料稱江氏籍貫時云「陳留圉」，而江統之後則多稱「濟陽考城」。據《晉書·江統傳》及《魏書》卷七十一《江悅傳》所載，江統於永嘉四年（三一〇）西晉末的永嘉之亂中因避難而奔于成臯（今河南滎陽），隨後又南徙渡江而居於江南。

又由《宋書·州郡志》所記以及江淹詩文中所透露出來的訊息，濟陽江氏南徙渡江之後乃族居於當時南徐州之京口，即今江蘇鎮江，所以江淹乃是事實上的江蘇鎮江人，現存的宋《嘉定鎮江志》及元《至順鎮江志》在「僑寓」類明確記載江淹爲鎮江人，也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濟陽江氏雖然是當時著名的大族，但江淹的一支卻並不貴顯，不過江淹的祖父江耽及父親江康之仍然做過縣令這樣的官職。江淹的母親祖籍在平原高唐（今山東高唐），是梁代著名學者劉昭的姑母。平原劉氏也是從北方流亡至江南的士族，南渡後族居之地大約在今江蘇無錫一帶。劉昭的祖父與父親官職也不高，地位與江淹的家庭大致相當。從以上情況來看，江淹的家庭在當時應該是一般的中下層士族。

江淹的《自序》說他六歲即能屬詩，可見他早年曾受過良好的教育，家境應該還是不錯的。但是由於他的父親江康之在他十三歲的時候即去世，從此他的家道逐漸衰落，漸趨貧窮。《梁書》江淹本傳說他「少孤貧」，應該正是從他父親死後開始的。陳何之元所撰《梁典》及《南史》江淹本傳也都說他年十三，孤貧，常采薪以養母。因此早年江淹的生活應該是相當艱苦的，而這一段生活對他的成長以及堅韌性格的形成又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江淹早年勤奮好學，《文選》卷十六江淹《恨賦》李善注引劉璠《梁典》說他「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他的《自序》自稱：「長遂博覽羣書，不事章句之學，頗留精于文章。所誦詠者，蓋二十萬言。而愛奇尚異，深沉有遠識。」從他二十歲左右所創作的詩歌來看，這些話應

該是可信的。由於他的博學和早年所顯示出來的創作天賦，他很快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注意，並得到他們的賞識，其中對他幫助最大的就是當時的著名文士檀超。《南史》江淹本傳說他「早爲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他的事蹟，見載於《南齊書》卷五十二《文學傳》，說他「好文學，放誕任氣」，又說：「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郗超字景興，一字嘉賓，與檀超同爲高平金鄉人。郗超是東晉時期的著名人物，在當時與東晉名將謝玄并稱。《晉書》卷六十七《郗鑒傳附郗超傳》說他「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有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檀超以郗超自比，並以爲自己更要優於郗超，可見他自視甚高。《南齊書》檀超本傳曾記載了一則佚事，說檀超早年「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檀超所說的「老姥」，即宋高祖劉裕之母孝懿蕭皇后，蕭惠開爲其侄孫，乃當時的著名貴戚。檀超與蕭惠開共事而不爲之下，更顯示出他狂傲張揚的個性。檀超在年齡上大於江淹許多，江淹青少年時期，檀超久已成名，爲當世所重。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卻不僅禮待江淹，而且「常升以上席」，這當然會使江淹名聲大振。以他孤苦貧寒的出身，在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時期即能出入諸王王府，檀超的獎掖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四六三），年方二十歲的江淹即踏上仕途，由南徐州京口來到京都建康（今江蘇南京），爲當時的始安王劉子真和建平王劉景素等講授「五經」，成了他們的發蒙教師。

當時始安王子真年僅七歲，建平王景素年十二歲。子真爲孝武帝劉駿之子，景素則是孝武帝最爲信任的弟弟建平王劉宏之嫡子，這時劉宏已死，所以景素繼承了王位。同年冬，江淹又被正式任命爲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劉子鸞的從事，不久又轉爲奉朝請之職。新安王子鸞爲孝武帝第八子，且爲孝武帝寵妃殷氏所生，因此愛冠諸子。子鸞是時年僅八歲而被任爲南徐州刺史，只是虛職，并未到京口任所而留在京都建康。所以，江淹在子鸞幕府期間仍然居於京都并周旋于諸王之間。

作爲一個出身并不高貴的中下層士族，在當時頗重門第的時代，江淹能在二十歲就成爲諸王的塾師并得以担任孝武帝寵子的從事，乃是非常幸運并且難得的事情。此時的江淹，可以說是志得意滿。如果照此發展下去，江淹的前途將會是一片光明。然而就在江淹二十一歲的大明八年（四六四），形勢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年的閏五月，宋孝武帝病死，繼任的是他的長子劉子業，因爲子業後來被其叔宋明帝所廢，所以史稱前廢帝。子業是孝武帝王皇后所生，由於孝武帝寵愛殷妃及新安王子鸞，所以子業即帝位之前就心存不滿，對子鸞懷恨在心。加之子業爲人心胸狹窄，剛戾兇狠，在他即位後僅兩個月，就免去了子鸞的司徒之職，讓子鸞前往南徐州就任，次年的九月，子鸞即被子業賜死。在這種情況下，江淹乃進入了始安王子真幕府，成了子真幕府中重要一員。當時子真的職務是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幾個月後，子真又先後改任丹陽尹及南兖州刺史之職，前廢帝景和元年，江淹於是又隨子真到了南兖州的治

所廣陵（今江蘇揚州）。在子真幕府期間，子真上給朝廷的章、表等大多出自江淹之手。

前廢帝子業不僅深恨子鸞，而且對他的幾個叔叔和弟弟以及朝中的大臣都非常猜忌，常欲置他們於死地。對政治形勢頗為敏感的江淹大約已經對此有所預感，加之新安王子鸞無端被殺的陰影猶在，所以他在當時陪侍子真登石頭城時所作的《侍始安王石頭》詩說：「暮情鬱無已，流望在川陽。」攬鏡照愁色，從坐引憂方。山中如未夕，無使桂葉傷。」在隨同子真前往南兖州廣陵就任途中所作的《從征虜始安王道中》詩說：「結軒首涼野，驅馬徼寒城。容裔還鄉懼，逶迤去國旌。」徒慚恩厚概，空抱春施名。仰願光威遠，歲晏返柴荆。」就表現出了與他二十歲左右青年人的心態非常不協調的憂慮傷感之情。

江淹隨始安王子真到達南兖州廣陵僅僅三個月左右，也就是前廢帝景和元年十一月，宋王朝即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由於前廢帝子業的荒淫暴虐，威脅到諸王的生命安全，也引起了在朝諸大臣的不滿。因此，子業的叔父湘東王劉彧乃乘機結連內侍，入宮殺了子業并自立為帝，這就是歷史上的宋明帝。因為不滿明帝劉彧的弑君自立，宋孝武帝的幾個兒子與相當一部分大臣紛紛起兵反抗，劉宋王朝終於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內戰，戰爭幾乎涉及整個國家，直到泰始二年（四六六）的八月，反對者的大本營江州的尋陽（今江西九江）才被明帝的軍隊所攻破，反抗者所尊奉的孝武帝第三子晉安王子助被殺，戰事才基本結束。宋明帝為了鞏固政權，消除隱患，乃盡殺孝武帝諸子，年僅十歲的始安王子真也在這年的十月被明帝賜死。繼任南兖

州刺史的是建平王劉景素，江淹在數年前曾是建平王景素的塾師，所以景素對江淹相當瞭解和信任。江淹逃過這一劫難之後，仍留在廣陵，成了建平王劉景素的幕僚。他的《自序》說：「始安之薨也，建平王劉景素聞風而悅，待以布衣之禮。」可見他當時在劉景素的幕府中雖然並無職務，但卻是賓客的身份，劉景素對他還是頗為禮遇的。

然而命運多舛的江淹在這時又意外地遭遇到一次人生的重大挫折。在泰始三年（四六七）的八月，廣陵令郭彥文犯罪下獄，此事牽連到江淹。有人乘機告發說江淹有接受賄賂之嫌，江淹因此而被捕下獄。至於這次被捕的真正原因，據江淹《自序》說，乃是他「倜儻不俗」，即因年少氣盛、恃才傲物而招致了同僚的忌妒。從江淹的生平行事看，他的這個說法是比較可信的。在獄中，他寫下了《詣建平王上書》一文，向景素陳述冤情。文章發端即援引古人之事，敘述自己的冤屈，說：「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此後他敘述獄中苦況與心情說：「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文中又說：「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

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聲情并茂，慷慨激昂，語氣又不卑不亢，感人至深。文章模擬西漢鄒陽《獄中上梁王書》與司馬遷《報任安書》，採用駢散結合的筆法，淋漓盡致地表達了當時的感受，乃是歷來傳誦的名篇。錢鍾書于《管錐編》「二〇八」論此文說：「按齊梁文士，取青妃白，駢四儷六，淹獨見漢魏人風格而悅之，時時心摹手追。此書出入鄒陽《上梁孝王》、司馬遷《報任少卿》兩篇間……雖于時習刮磨未淨，要皆氣骨權奇，絕類離倫。」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無怪乎劉景素在見到這篇文章後深受感動，立即就釋放了他。

不久，劉景素離開南兖州刺史任，回到京都建康擔任丹陽尹之職，江淹也隨之南歸。大約在回京後的第二年即泰始四年的春天，江淹即被南徐州刺史桂陽王劉休範舉為秀才，隨後又在當時例行的秀才對策中得到上第，從而被任命為巴陵王劉休若的王國右常侍之職。當時巴陵王休若正在湘州刺史任上，這一年的秋天，江淹乃沿長江西上，前往湘州治所在地臨湘（今湖南長沙），結束了他艱難坎坷的青少年時代，踏上了他人生的新旅途。

二、忠心耿耿的建平王幕僚

在前往湘州臨湘的途中，江淹經過南朝當時西部的政治經濟中心荆州的江陵（今湖北荊州），遠望江陵近郊的著名山脈荆山的景物，不禁感慨萬千，寫下了他早年的代表作之一《望荆山》詩：

奉謁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途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染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聞《苦寒》奏，再使艷歌傷。

除了他的《雜體三十首》以外，詩人被《文選》所收錄的詩作并不多，此詩乃是其中之一。詩中描繪所見荊州一帶的秋景，氣勢雄渾壯闊，但已不似元嘉詩人寫景詩的峭刻與崇尚藻飾，而顯示出一種較為清秀自然的風格，明顯表現出了從元嘉向永明詩風過渡的痕跡，對後來謝朓的詩歌創作有着較大的影響。由於他這時離出南兗州獄不久，在獄中與獄吏爲伍的陰影還未徹底消除，因此在詩中展示出來的是一片蕭瑟的秋景，回蕩着濃厚的悲秋氣氛，含蓄地烘托出了他當時遠適異鄉的傷感之情。歷來的文學評論家對此詩都有頗高的評價，可見并不是偶然的。

這次途經荊州時，詩人還創作了一篇《哀千里賦》，賦中寫道：「既而悄愴成憂，惘默自憐。信規行之未曠，知距步之已難。雖河北之爽塏，猶橘柚之不遷。及年歲之未晏，願匡坐於霸山。」抒發了與《望荊山》詩同樣的哀怨之情。

江淹在巴陵王休若幕下僅有幾個月時間，在泰始五年（四六九）的春夏之間，他即離開了休若幕，從臨湘回到京都建康，重新進入了建平王景素的幕府，當時景素正在丹陽尹任上。不久景素轉任吳興（今浙江吳興）太守，江淹又隨之到了吳興。從這時開始，一直到宋後廢帝元徽二

年（四七四），他始終在景素幕中，對景素有著深厚的感情。加上此前在南兖州廣陵的一段時間，詩人在景素幕中先後大約共生活了八年時間。所以他在日後所作的《被黜爲吳興令辭牋詣建平王》一文中，有「竊思伏皂九載，齒錄八年」的說法。

泰始五年歲末，景素被任命爲湘州刺史，因此在泰始六年（四七〇）的春天，江淹又一次有了湘州之行。在途經著名的廬山時，建平王率隨從登上廬山，不由詩興大發，寫下了一首讚美廬山的詩篇，江淹也因此而寫下了一首和作《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景素原作已佚失，江淹和詩云：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峰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正翕耏，玉樹信葱青。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蜿蜒，俛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恩托後旌。

這是一首詩人早期的名作，也被蕭統收入了《文選》。由於建平王景素愛才好士，詩人在景素幕中的心情應該十分愜意，加之被繫南兖州獄時殘存的陰影已經逐漸消除，所以詩中的心情顯得頗爲輕鬆，色調也較爲明快，充分表現出了廬山如仙境般的空靈境界。結尾則對建平王予以

讚美并表示追隨與盡心輔佐的願望。事實上，江淹此詩末所說的并非是一般的應酬，也并非阿諛奉承之辭，在日後追隨景素的過程中，他確實盡到了全力輔佐景素的責任。

泰始七年（四七一）二月，景素由湘州刺史改任爲荊州刺史，江淹代景素寫了《建平王讓右將軍荊州刺史表》和《建平王拜右將軍荊州刺史章》二文。到荊州後，江淹即被任命爲景素的右軍主簿，并作有《到主簿日事詣右軍建平王》一文。在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景素所上給朝廷的章、表及在荊州所發佈的教文等，大多出自江淹之手。

重新進入景素幕的早期，詩人與景素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比較融洽的，所以在《自序》中他說曾被景素「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在泰始六年時他也寫出了《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這種在他的詩作中少有的沒有抒寫憂怨之情的詩篇。在此期間，他還寫下了《秋至懷歸》、《步桐臺》、《渡西塞望江上諸山》、《寄丘三公》、《感春冰遙和謝中書二首》等詩篇，這些詩中，他雖然也寫憂情，自稱「憂人」，表現歸隱的願望，但這應該是詩人對政治的敏感、對宋明帝末年無情殺戮諸王的擔憂所致，并不像後來所作詩篇的消沉與憤激。然而時隔不久，形勢又一次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泰豫元年（四七二）四月，宋明帝劉彧病死，繼任的是他的長子劉昱，也就是歷史上的宋後廢帝。宋明帝臨死前，已經開始猜忌景素，因爲懷疑景素會對他的繼任者造成威脅，他臨死前遺詔改任景素爲太常這一閒職，以防止景素在荊州割據一方，擁兵自重。後廢帝即位以後，任用近臣阮佃夫、王道隆等，無端誅殺大臣，大臣人懷危懼，朝政一片混亂。而建平王景

素這時已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羽翼也逐漸豐滿，加之他因禮待士人，修身潔行，撫接百姓，從而深得朝野之心。朝中一些大臣乃屬意景素，希望他能取後廢帝而代之。《宋書》卷七十二《建平王宏傳附景素傳》記載，當時「朝野翕然，莫不屬意焉。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在這種形勢下，後廢帝劉昱的生母陳氏的親屬，以及其所寵幸的近臣阮佃夫、楊運長等乃深忌景素，派遣耳目，對景素嚴加防範。當時的荊州，乃是南朝西部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心，荊州刺史實際上管轄當時的荆、湘、雍、益、梁、南北秦數州，可以說是西部之長。景素擔任荊州刺史，無疑掌握了西部地區的政治軍事大權。而回京擔任太常之職，實際上等於交出了一切權力，後果的嚴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當時在景素的僚屬中，就有許多人爲了追求榮華富貴而力勸景素乘機起事，景素也爲了自身的安全，所以就與其親信密謀自全之計，企圖發兵東下，奪取政權。此時江淹分析形勢，認爲在當時的條件下，景素一旦發兵，則必敗無疑。於是他乃不顧利害，以西周王朝管叔、蔡叔謀反失敗的教訓向景素進諫，告誡景素不要輕舉妄動。這時的景素在左右親信的慫恿蛊惑之下，不免有些喪失理智，飄飄然起來，他不僅沒有採納江淹的意見，反而對江淹有所不滿，從此逐漸疏遠了江淹。

泰豫元年七月，景素經過再三權衡，決定先行回京都以待機而動，途中江淹作有《江上之山賦》一篇，其中說：「嗟世道之異茲，牽憂患而來逼。惟爐炭于片景，抱絲緒於一息。每意遠而生短，恒輪平而路仄。信懸天兮竊昧，豈繫命於才力。既羣龍之咸疑，焉衆狀之所極！俗逐事

而變化，心應物而迴旋。既歛翕其未悟，亦緯繡而已遷。伊人壽兮幾何？譬流星之殞天。悵日暮兮吾有念，臨江上之斷山。雖不敏而無操，願從蘭芬與玉堅。」對當時局勢的變幻表示了無限的擔憂。這年的閏七月，景素又被改任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江淹也隨景素來到了南徐州刺史治所所在的京口（今江蘇鎮江），并被任爲景素的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來到京口以後，元徽二年（四七四）友人袁炳的英年早逝，又使他在精神上遭受到重大的打擊。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乃是被詩人稱爲與之有「神交」的最爲信賴的摯友，死時年僅二十八歲。在袁炳死後詩人所作的《袁友人傳》中，曾對他作了極高的評價，說：「其人天下之士，幼有異才，學無不覽，文章儼儼清贍出一時。任心觀書，不爲章句之學。其篤行則信義惠和，意罄如也。常念蔭松柏，詠詩書，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俛眉暫仕，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湘令。粟之人者，悉散以贍親。其爲節也如此，數百年未有此人焉。」詩人在泰始五年所作的《報袁叔明書》，元徽二年所作的《與交友論隱書》，都是與袁炳的書信往來之作。二文受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及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的影響，駢散結合，敘事抒情自然流麗，極富感染力，乃六朝書信散文中的名篇。錢鍾書《管錐編》「全梁文卷三十八」以爲《與交友論隱書》乃「嵇康與山巨源之遺」，與《報袁叔明書》同爲「氣骨權奇，絕類離倫」之作，是很有道理的。《報袁叔明書》說：「若十口之隸，去於飢寒。從疾舊里，斥歸故鄉。箕坐高視，舉酒極望。雖五侯交書，羣公走幣，僕亦在南山之南矣。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士言也。」《與交友論隱書》說：「今

但願拾薇蕢，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將自己的內心思想，毫無保留地向老友全盤托出，既不矯揉造作，也沒有絲毫的隱藏，足見二人友情之深厚。如今老友英年早逝，怎能不使詩人爲之痛哭流涕。爲此，他一連寫下了《傷友人賦》、《袁友人傳》以寄託其哀思。《傷友人賦》中說：「凋碧玉之神樹，銷紫石之靈根。永遠書于江滌，結深痛於爾魂。魂線昧其若絕，泣縈盈其若結。吝妙賞之不留，悼知音之已逝。」《袁友人傳》則說：「嗟乎！斯才也，斯命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何如哉！」寥寥數語，表現了詩人內心極大的悲傷之情。再加上當時局勢的危重，更使詩人在這一時期的詩文創作中充滿了人生無常、世事難料的悲憫之情。

在南徐州，建平王景素陰謀反叛之心愈加顯露，與其左右心腹日夜謀議，以求一逞。江淹此時見自己直言進諫已不可能被景素所接受，於是意欲通過微言托諷的手法，以圖使景素懸崖勒馬。由此，他作了十五首五言詩以爲諷諫，這就是現存的《效阮公詩十五首》。這一組詩模仿阮籍《詠懷詩》，大量運用比興的手法，委婉曲折地表達了自己的見解。雖然較爲含蓄，但規勸之意還是相當明顯的。如其中的第四首：

飄飄恍惚中，是非安所之。大道常不驗，金火每如斯。忼慨少淑貌，便娟多令辭。宿

昔秉心誓，靈明將見期。願從丹丘駕，長弄華池滋。

此詩借遊仙的題材，表現世事的難爲，暗示反叛的難以成功；以小人的美言令辭對比自己的逆耳忠言，最後則說明天命無常、禍福難料的道理。又如第十一首：

擾擾當途子，毀譽多埃塵。朝生與馬間，夕死衢路濱。藜藿應見棄，勢位乃爲親。華屋爭結綬，朱門競彈巾。徒羨草木利，不愛金碧身。至德所以貴，河上有丈人。

指斥那些慙惠景素謀反的小人爲了自身的榮華富貴而不惜冒險以求一逞，警告他們最後必然會落得可悲的下場，最後又指出道家全身遠害的可貴。以上數首詩作規勸景素的意思都相當明顯。此外，這一時期他還寫下了《燈賦》、《扇上彩畫賦》、《遂古篇》等作品，或托物言志，或暗喻諷諫。《遂古篇》全文模仿屈原《天問》，對古代的傳說表示疑問，文中有云：「六合之內，心常渾兮。幽明詭性，令智昏兮。」顯然針對景素的異謀，指斥景素等人的利令智昏。結尾說：「茫茫造化，理難遁兮。聖者不測，況庸倫兮。筆墨之暇，爲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子。」文中的「君子」，也明顯指景素而言。與屈原的《天問》，同樣寄託了政治上失意的憂憤。但是在當時，景素一方面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已經騎虎難下，正所謂箭在弦上，不